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下）

王伟光 程恩富 胡乐明*



【内容提要】当前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当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经济结构以及经济调节等方面的具体矛盾的现实表现。尽管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对于促使经济稳定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没有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其他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其缺陷及负面影响将在未来逐渐显现，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关键词】金融和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作者王伟光（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732）；程恩富（1950-），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 100732）；胡乐明（1965-），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732）。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规避金融和经济危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置身于世界性危机之外。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亦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我们必须正确认识中国没有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1. 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使中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

此次危机对于我国的冲击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贸易方面，也有思想文化方面；既有短期影响，也有长期影响。就经济方面而言，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了我国出口大幅下降、失业人数有较大攀升、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更加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加大了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压力，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挑战。

此次危机延缓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8年以超过8%的速度且不断加快的态势持续快速发展。2008年以来，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不利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得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外需的急剧萎缩，我国对外贸易首当其冲地遭受了愈益严重的冲击，经历了自1998年以来的最大波动，与入世后连续6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相比，外贸进出口增速出现明显回落。2008年，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与中国对策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课题主持人为王伟光，课题组组长为程恩富、胡乐明，课题副组长为余斌，课题组成员有杨斌、杨静、曾宪奎、王佳菲、牛正科、李洪江等。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25616.3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17.8%,增速同比减缓5.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4285.5亿美元,增长17.2%,增速同比减缓8.5个百分点;进口11331亿美元,增长18.5%,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11月我国进口同比增长-17.9%,出口同比增长-2.2%,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1%,对外贸易正式步入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较大幅度的负增长阶段。同时,此次危机还导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放缓、外商投资持续减少、金融机构蒙受较大损失等问题的出现。总需求的不断萎缩导致我国许多重要宏观经济指标日趋恶化。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虽然全国就业人员比上年末增加490万人,但是从业人数增长率却迅速下降为0.64%,与2006年相比下降幅度为0.12个百分点,与2004年相比下降幅度高达0.39个百分点;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从2007年的0.98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0.85,达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2007年的4%升高到2008年的4.2%。同时,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增速回落了4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的态势,而且,经济增长速度在2007年第二季度之后连续七个季度出现逐季回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显,2009年第一季度更是下降到6.1%,为17年以来的最低。

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凸显了我国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长期以来,我国的需求结构极不合理,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的比例严重失衡,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贡献率明显偏低,外贸依存度显著偏高。从1978年至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8.8%下降到35.3%,不仅大大低于世界55%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远低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外贸依存度则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超过60%的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同时,我国企业长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2008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仅为1.52%,不仅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也低于世界1.6%的平均水平;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40%,发达国家则超过70%;我国设备投资的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60%,美、日等国则仅为5%。总之,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依赖的经济发展方式。显然,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发展动力难以持续的“风险之路”,是一条资源环境难以支撑的“负重之路”,是一条竞争能力难以提升的“低端之路”,是一条人民福利难以增长的“物本之路”^①。此次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表明,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刻不容缓。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危险往往在危机结束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对全球过去88次金融危机的经验研究表明,危机结束后的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比趋势平均线会低10%,而且这种持久性损害一般要持续7年以上的时间才可能消失^②。可以预见,为了抢食后危机时代相对缩小的全球经济蛋糕,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必将更加激烈,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环境。为维持以美元为中心的不合理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竭力打压中国在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话语权和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还将通过把全球经济失衡和危机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等手段不断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施压人民币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改革,将中国经济彻底纳入金融垄断资本的“国际大循环”,降低中国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为保护本国企业和缓解社会矛盾,西方发达国家将继续通过各种

① 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年3月2日。

② 李向阳:《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面临低速增长》,《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6日。

贸易保护主义手段,遏制中国的出口竞争和经济增长。2008年,中国遭遇反倾销调查73起、反补贴调查10起,分别占全球案件总数的35%和71%,涉案金额为62亿美元;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57起反倾销、9起反补贴,涉案金额约102亿美元。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后危机时代中国无疑将遭遇更多贸易摩擦,且贸易摩擦将呈现日趋多样化、综合化、隐蔽化和道义化等特点,对我国政府和企业构成新的严峻挑战。为维护产业垄断资本的利益和遏制全球经济地位的下滑,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将通过“再工业化”牢牢掌控汽车、机械、成套设备等行业的优势地位,还将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以低碳经济为利器,有战略、有步骤地拉抬自己的竞争能力,全面主导新一轮全球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面临被西方发达国家拉大差距、加大对外依存度的风险。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马克思关于商品和商品交换内在矛盾,关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一般可能性的科学分析,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莫能外。然而,同样的市场经济与不同的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相结合,会具有不同的根本性质和运行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周期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制和国家有效调节的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可规避性、可防范性^①。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可以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不可改变性,却不能改变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强化规避风险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作用,经济危机的抽象形式便会转化为现实可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不断地巩固、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地位与国有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地位,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私人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贪婪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②因此,私人资本的扩张和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极易导致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人民大众有效需求的不足;放大“市场失灵”的危害,导致政府调控与资本博弈失败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陷入“劳德代尔悖论”式的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引发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影响下,在频繁的危机和动荡之中,原苏联和东欧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也有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理论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若不能确保公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处于主导地位,放任私有制经济及其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发挥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失去免疫力”,难以有效规避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放任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地导致和谐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自发实现,应

^① 王伟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和原因》,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

该尽可能地让政府退出经济生活，寻求所有经济问题的基于私有产权的市场化解。然而，完美竞争的市场并不存在，现实的市场并非是一个真空的机械装置而是权力的角斗场。脱离了政府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固然有利于较为充分地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同时也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可避免地扩大，社会生产的各种比例关系经常性地处于失衡状态，引发各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挟其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欲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职能不断泡沫化、空洞化，政府的组织功能不断地萎缩甚至消逝，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政府的作用进行科学审视与合理定位。由于政府作用定位失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甚至陷入激烈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动荡之中。世界各国的发展表明，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各个领域甚至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与范围都将不可避免地扩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让市场起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作用，取消国家宏观调控的职能。没有政府作用的恰当而有效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也就无从谈起。只有不断完善和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充分而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我们才能有效规避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陷入高度的对外经济依赖，我国同样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开放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自主发展基础之上的开放发展，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然而，如果简单地接受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盲目融入西方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不仅不能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反而会被资本主义所利用，难以获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应得利益，难以有效应对资本主义全球性的市场失灵。如果对外开放程度过高过快，不能合理把握经济开放进程，不能采取有效的公共政策以提高国内产业适应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难以有效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果不能合理利用国际国内的资源、市场和技术，陷入高度的对外经济依赖，就会出现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现象，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危机发生“共振”，难以避免输入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权利，同时坚持科学合理的对外开放，实现自主发展与开放发展的有机结合，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效规避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3. 正确认识中国没有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尽管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但是我国并没有陷入此轮危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向好趋势也没有改变。正确认识中国没有陷入此轮危机的原因，无疑有助于我们有效防范和科学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使中国避免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首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国抵御此轮危机的冲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帝国主义的掠夺和长期战争使中国经济积贫积弱。新中国成立以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更是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总量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GDP 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这为我国抵御各种经济风险和应对此次危机冲击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其次，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大大降低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有效抵御各类外来危机的冲击。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为抵御本次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公有制经济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的中国金融体系较为有效地避免了信用危机的发生，同时较为有效地实现了信贷总额的迅速扩张，对于扩大企业投资、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内需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里发挥主导作用的国有经济较为有效地维护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同时较好地履行了保障就业、稳定价格等社会责任；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国有经济也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再次，包括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民族区域自治制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拥有灵活高效的决策执行体系，可以高效调配资源、合力解决重大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①面对此次危机的巨大冲击，我们党和政府迅速反应、科学决策、果断部署，从推出一揽子计划到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拉动经济增长到不断改善民生，从促进改革发展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全国范围、各个领域形成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强大合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重大危机和外来冲击的强大政治优势。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证，我国难以避免陷入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泥潭。

应对危机措施的有效性是使中国避免陷入危机的重要保障。面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我们党和政府确定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总体思路，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的各项政策^②。这是避免中国陷入此次危机的重要政策保障。首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较为迅速有效地扩大了消费需求和国内需求。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投资 1.18 万亿的总额高达 4 万亿的两年投资计划，直接增加了投资需求并带动了社会资金和民间资本的投资支出。注重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实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刺激消费的积极政策，较好地稳定和增加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其次，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较快地稳定了外部需求和对外贸易。在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积极加强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和服务外包基地建设，支持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充分发挥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的作用，妥善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使得外经外贸较快地得到了稳定。再次，大范围实施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着力进行结构调整，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着眼增强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未来竞争能力，制定并实施了汽车、钢铁、装备制造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高强度地推进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不仅有效应对了此次危机的冲击，也提升了应对未来国际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最后，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投入，扩大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以及实施其他以改善民生为目的的政策，较好地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未来收入和消费预期，增强了人们战胜危机的信心。显然，上述政策措施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兼顾短期与长期，统筹国际和国内，为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0页。

② 刘云山：《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和启示》，载《求是》2010年第1期。

五、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照搬西方模式而成为现代强国，也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适合所有的民族国家。此次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国家在质疑和批判西方模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中国而言，有效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科学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更加坚定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

1. 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有效规避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必须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前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矛盾以及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有利于克服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从而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为了有效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必须始终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始终确保公有资产的优势地位。既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资产的量的优势，更要注重公有资产的质的提高。必须合理调整公有资产的布局与结构，完善公有资产的监管与经营，不断提高公有资产的整体素质和配置效率，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资产在稳定宏观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其次，必须巩固和壮大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须始终保持国有经济在包括金融产业在内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等重要行业以及关键领域的控制地位，必须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管理制度，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带动力和影响力。再次，必须不断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绝不允许以土地私有化代替我们党提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瓦解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必须积极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为农业改革和发展的“第二个飞跃”创造条件。此外，必须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有效实现形式。只有积极探索和大胆利用包括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在内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公有制各种有效实现形式，才能真正解放和提高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效率，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特点的客观要求。个体、私营、外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充分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与积极因素，有利于增加就业、满足需要，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抵御各种外来危机的冲击提供物质保障。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必须长期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首先，加强制度创新，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应将放宽市场准入、实现公平竞争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其次，鼓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影响作用。引导公有制与非公有制

企业相互参股、相互融合,通过公有制经济带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将其发展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轨道。再次,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强化非公有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整体素质,推动非公有制企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和抗御各类风险的能力。此外,必须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增强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切实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努力克服生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辩证把握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绝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承认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作用,并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简单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者对立起来。其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等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共产党执政和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坚实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就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就难以有效地防范与应对各类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与冲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必须服务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能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为前提。再次,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不等于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发展而不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既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社会潜在经济资源,也是公有制经济巩固和发展自身的需要^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辩证否定私有制的必然要求。

2. 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基础之上的有调控的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所在。只有不断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扩张性,克服私人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无序化、极端化,努力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平衡性和持续性,我们才能有效规避与防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科学应对西方国家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完善市场与政府的调节功能,强化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必须合理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经济的成功经验,多结构、多层次地发展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作用,健全宏观经济预测体系,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频繁地爆发金融和经济危机,除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周期性激化这一根本原因,也与市场自发调节的短期性、盲目性和政党轮替导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局限性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调节,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强化政府的长期规划和计划调节功能,科学制定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规划,努力保持各项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既发挥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

^① 程恩富、何干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光明日报》2009年4月5日。

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去纠正“市场调节失灵”，建立一种“基础—主导”双重调节机制，形成“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调节格局，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①。

提升政府微观规制和宏观驾驭能力，有效“节制资本”。必须通过《公司法》等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赋予人民群众拥有管理生产过程和决定剩余产品分配的权利，节制资本的逐利倾向和剥削行为，提升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实施经济政策、制定经济规则等手段，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规模和活动范围，使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严格控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的 necessary 范围之内，防止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资本主义化”。同时，必须提高无产阶级国家政府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驾驭能力。确保非公有制经济受制并服务于社会主义，关键在于正确发挥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为此，必须协调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经济基础多元性之间的矛盾，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统领，从而保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制度方向；必须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资本膨胀，警惕“权钱腐败联盟”；必须加强人民民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各项公共事务管理和决策的范围和程度，真正实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②。

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并日益成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为有效调节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盲目性，维护社会经济的稳定性与平衡性，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的积极作用，矫正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偏差，弥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空场”。必须有效增加教育、科学、信息、安全秩序和社会舆论等领域的政府投入和公共物品供给，为社会调节和伦理调节作用的发挥提供基本的平台保障。必须努力通过法制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保障社会成员的自由、公正权利，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食品、医疗及教育，实现“特定的平均主义”，尽力化解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结构性利益矛盾以及社会心理情绪和社会心理诉求失衡的现象。必须依靠法律、行政和经济等手段为民间组织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提供较多的渠道，提高社会公众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的能力，积极培育与政府合作的民间组织。必须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倾注更多的政府关注。离开成功的意识形态，任何制度的维持或创新都是不可能的。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为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必须投入一定的公共资源，整合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追求，打破个人利益至上的市场价值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人们的经济行为，构建良好的“利益追求—道德文化”互动架构。

统筹国际和国内，提升政府应对国际形势变幻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外部世界的种种不确定性与危机的冲击，我们应进一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有效提升政府应对各种危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必须加强国际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对货币稳定、汇率、利率、金融和信贷体制的稳定等领域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努力使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加强金融规制以防范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殖民”。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对于具有战略意义和高风险的新技术产业（生物技术、网络经济、空间技术、低碳技术、数字化经济），政府不仅应增加投资并带动民间投资，更应增加规制其发展的规则和管理

① 程恩富：《中国模式的经济体制特征和内涵》，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② 胡乐明、刘志明、张建刚：《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

的供给,遏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殖民”。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博弈,防范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则殖民”。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凭借其在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一直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和“宪法条款”以国际惯例之名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合理承担国际义务和接受国际规则,避免陷入西方资本主义规则体系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的冲击。

3. 防范与应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必须转变和提升经济发展方式

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表明,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①。此次西方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使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软肋”尽显。适应全球经济结构重大变化,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增强我国经济防范和抵御各类危机发生与冲击的能力,迫切需要全面转变和提升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②。

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适应全球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必须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提升消费拉动增长的作用,努力做到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协调。必须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尽快提高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切实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扭转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构建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持续扩大农村消费;必须着力改善民生,加快交通、通信、电力、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完善社会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基础教育和健康卫生方面的公共投资,逐步缩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分配差距,有效改善人们的消费预期,提高消费倾向。

适当控制外资依存度,提升协调利用中外资的效益。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曾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外资向我国转移污染企业和垄断我国的食用油、种子等战略性行业,外资不仅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和经济代价,而且对内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同时,外资的大量涌入导致外汇储备和对外贸易顺差异常增加,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安全,加大了国际经济摩擦。为此,应逐步取消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保证国内企业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应提高环保标准等投资门槛,调整引资政策,引导外资投资方向,使外商的投资逐渐向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应运用经济、法律的手段制止跨国公司控制和垄断我国产业的行为,保证我国经济安全;应加快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建设,充分利用国内闲置资金,为中国的民族企业的发展扩展空间。

努力降低外技依存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重大挑战,把握先机、赢得主动。过度依赖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只能丧失技术进步的动力,导致贸易结构畸形、贸易条件恶化、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一支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人才队伍;加大自主创新的研发经费投入,为自主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努力在若干重要领域、重要产业掌握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控股、控技、控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突出培育和发挥知识产权优势,尽快完成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型。

① 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年3月2日。

② 程恩富:《“五个提升”促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载《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11期。

适当降低“外源”依存度，提升配置资源的效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能源和资源进口急剧增加。石油从1993年成为净进口国以来，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目前达到46.6%，已接近50%的警戒线。外源依存度过高不仅容易引发国际争端，也容易威胁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引发各类危机。因此，必须科学制订国内能源和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和保护计划，提高国内矿产资源开发的门槛限制和企业标准，提升国内矿产资源的开发效率；必须适当提高资源消费价格，引导资源消费行为，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必须大力鼓励和支持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力支持低碳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和应用，限制“三高一低”项目的发展，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必须加强石油、黄金、有色金属、煤炭等各种稀缺资源的战略性管理，提升资源类商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和市场控制力。

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规模，提升使用外汇的收益。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对外支付和清偿能力，防范国际收支和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高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但是，如果长时间和大幅度地超过合理规模，则必然给经济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解决外汇储备过度的问题，不仅要控制低收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从根源上减少贸易顺差，降低外汇储备激增的速度。同时也要合理配置已有的外汇资源。应考虑主动运用不断贬值的美元外汇储备，赎回被美国企业收购的中国重要国有企业资产，收购控制着中国战略性行业的跨国公司股份，引进国外的关键技术和科研人才实现“引智创新”，帮助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源和有价值的实体企业，减少美元贬值带给中国持有美元资产损失的风险，降低货币资本储存的机会成本，提高资本配置的经济效率。

适当降低“外产”依赖度，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历史经验表明，危机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层次的重要机遇。适当降低对外国产业的依赖度，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产业链阴谋”（郎咸平语），提升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抵御未来国际经济风险的基本依托。必须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技术装备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力争使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链获取更高的附加值，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防止我国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必须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以及研发、物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制定中长期的国家产业创新战略，切实推进产业创新，抢占未来全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必须稳健开放金融业等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产业，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必须把握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为海外投资和跨国并购带来的重要机遇，提升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建立自主的全球生产体系，创造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①。

（编辑：张 桥）

^① 安毅、常清、付文阁：《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探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ABSTRACTS

Western Countri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Wang Weiguang, Cheng Enfu & Hu Leming etc.

Capitalist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have to lead to the present western countries'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which also show the concrete contradictions on capitalist microcosmic base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regulations, and another aspect. Western countries'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rises play some roles on resuming markets confidence and stabilizing the economy, but those did not eliminate the capitalist fundamental and concrete contradictions which lead to the present crises, and would be gradually coming clear with the deficiencies and negatives in the future. Western countries'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tendencies are not clear and complex. China should surely insist on going the great road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void and defend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es.

A Research on Intellectuals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Yan'an Period

Wang Haiju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theoretical intellectual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o research both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can enlarge the academic vision and enrich the research of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re are many experiences that we can make use of in today's socialism construction.

Climate Changes and Chinese Model of Low Carbon Econom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Theory of Natural Force Economy

Liu Jingnuan & Ji Yushan

This article uses Marx's theory of natural force economy to analyze the causes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s and puts forward Chinese model of low carbon economy. The current climate changes are the retorsions of natural forces incurred by the human overuse natural forces. This is a crisis characterized by inadequate supply of resources-based climate natural forces. It is the result of capital chasing surplus value and practicing "high carbon" economy chronically. If not be contained, it will lead to the depletion of the headspring of agriculture fortune and unsustainable overall crisis. Resisting climate changes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model of low carbon econom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force and found the doctrine of "fifth" factor of natural forces, with the green as keynote; proposing low carbon production and living pattern; establishing and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carbon trade,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abatement; preventing multi-channel shifts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low carbon economy.